

The Research Forum of Yangzhou Culture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第五辑

赵昌智 主编
广陵书社



扬州文化研究

论从

第五辑

The Research Forum of Yangzhou Culture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赵昌智 主编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5辑/赵昌智主编.—扬州:广陵书社,2010.10

ISBN 987-7-80694-628-2

I.扬… II.赵… III.文化史—扬州市—文集 IV.
K295.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7974 号

书 名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5辑
主 编	赵昌智
责任编辑	胡正娟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6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87-7-80694-628-2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清代扬州学派研究

- 1 《百尺梧桐阁文集》及其焦循评阅本述考

黄 强

文选学研究

- 11 选本的力量——《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之比较

顾 农

- 16 论新变潮流中的《文选》与《玉台新咏》

张亚新

维扬艺文

- 33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的几件新材料

黄进德,方晓伟

- 40 论《扬州画舫录》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贡献

王伟康

- 50 祭祀的理念与理念的祭祀——扬州纸扎技艺的考察与探讨

曹 田

印城史探

- 59 刘师培的“留别扬州人士”及其投身革命

汤志钧

- 69 金兆燕与两淮盐官、盐商关系述论

明 光

- 80 “谁当立者？”——十世纪初杨吴政权延续危机

胡耀飞

扬州名人

- | | | |
|-----|----------|----------|
| 97 | 李蟠论 | 张郁明 |
| 109 | 多才多艺的汪二丘 | 顾一平 |
| 115 | 吴让之年表 | 祝 竹, 朱天曙 |

书评

- | | | |
|-----|-------------------------------|-----|
| 141 | 《〈周礼〉饮食制度研究》序 | 祁龙威 |
| 143 | 一个有待于重新认识的刘师培——读万仕国编《刘申叔遗书补遗》 | 蒋 寅 |
| 146 | 潜心治学 嘉惠学林——读《龙威读书录》有感 | 沈秋农 |
| 150 | 一部赏心悦目的好书——《扬州艺术丛书》印象 | 赵昌智 |

广陵琴派研究

- | | | |
|-----|--------------------|-----|
| 154 | 广陵琴学源流 | 刘少椿 |
| 156 | 扬州琴史拾遗 | 朱 江 |
| 159 | 斫琴艺术的审美价值 | 马维衡 |
| 164 | 辨“广陵散”——《广陵散》绝响了吗? | 韦明铤 |

典籍选刊

- | | | |
|-----|----------|----------------------|
| 173 | 扬州历代疆域沿革 | (清)徐庭曾, 汪桂森编著; 曾学文整理 |
|-----|----------|----------------------|

《百尺梧桐阁文集》及其焦循评阅本述考

黄 强

《百尺梧桐阁集》乃焦循乡邦前贤汪懋麟的别集,最后定本包括《百尺梧桐阁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八卷、《百尺梧桐阁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十六卷、《百尺梧桐阁遗稿》诗十卷。懋麟另有《锦瑟词》单行。《百尺梧桐阁集》不仅因为著者的诗文创作成就而具有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因为著者的独特地位和影响,从而对清初文人交游和扬州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清初扬州文人别集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部。此集中的《文集》和《诗集》有焦循评阅康熙本,诸家在对焦循著述的著录中极少提及。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焦循评阅康熙刻本《文集》、《诗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锦瑟词》影印出版,书名即《百尺梧桐阁集》^①。2000年,齐鲁书社出版陈居渊的《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一书,末附《焦循著述考》,有著录云:“批点汪懋麟《百尺梧桐阁文集》十六卷,上海图书馆。”仅此数语,而且有误^②。1994年,台湾里仁书局出版赖贵三所著的《焦循年谱新编》(包括书后“补遗”十三则),2005年以来,大陆出版的数种研究焦循的书中,均未见使用此焦循评阅本中有用的资料,更谈不上全面考察。此本虽仅为焦循评阅之书,但在迄今为止所知的焦循著述,包括其批校评跋的诸书中,文人别集较少,清代扬州文人的别集更少,据此本可考知焦循文学活动的某些线索,补其年谱之阙,亦可由其评点文字略窥其文学思想的细微之处。鉴于《百尺梧桐阁集》自身的价值和焦循评阅本的特殊价值,笔者拟对《百尺梧桐阁集》及其焦循评阅本加以述考,以备采择。限于篇幅,先及《文集》,《诗集》则另文述考。

①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表示已将国家图书馆藏《百尺梧桐阁遗稿》诗十卷一并纳入,但成书中未见。

②汪懋麟《百尺梧桐阁文集》仅有八卷本和十卷本,《百尺梧桐阁诗集》才是十六卷;且著录未标明版本,如所叙确系焦循评阅康熙本,则应只有一部,不可能同时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一、《百尺梧桐阁文集》版本及其焦循评阅本考略

汪懋麟(1639~1688)^①,字季角,号蛟门,晚号觉堂,江都人。康熙二年(1663)举乡试,六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继丁内外艰,居丧尽礼。十八年荐博学鸿词,辞不赴。服阙,以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与修《明史》,撰史传若干篇,补《崇祯实录》若干卷。寻补刑部,仍直史馆,期间奉公执法,能辨白疑狱,发奸摘伏。后被劾罢归。懋麟自幼聪颖,笃志经史,曾受业于王士禛。为中书舍人时,每入直,公余夜读,手不释卷,由是学益精进,诗文日益为时人所称。被劾归乡后,杜门谢客,昼治经,夜读史,锐意著述。其诗典实而春容,慷慨而深沉,既与汪楫齐名,又为“辇下十子”之一。懋麟著述除诗词文及《明史拟稿》二卷以外,尚有《琉球国纪事》一卷及《四声古叶录》、《通志闲编》诸书,今皆未见,恐已不传。

对于懋麟诗文,王士禛《比部汪蛟门传》云:“君诗才票姚跌宕,其师法在退之、子瞻两家,而时出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岁为文章,峭刻近之。”^②杜浚序其《文集》云:“今蛟门之文,质坚而气厚,才地有余,而一禀于裁,不使篇有剩字,高古顿挫,使览者惟恐其尽,盖邮驿于王,以达于韩。”故推许其“文章第一,诗二,词三,二与三对文章言之,若孤行,仍不妨第一也”。^③焦循自然阅过这些序传之文,但他读懋麟之集,自有取舍的标准。

懋麟《文集》于康熙间陆续增刻,先后有三卷本、十卷本和八卷本。因三种版本卷首皆有杜浚康熙十七年戊午所作一序,诸家著录时往往据此序判定版本的刊刻年份,结果造成了版本演变状况的模糊不清,兹据相关资料加以梳理。

杜浚序本原乃康熙十七年懋麟自刻三卷本,杜序后有懋麟自序,诸本皆收入。自序末虽未署作年,但云:“余生十三四年,背塾师学韵语,谬为诗……今忽忽二十余年……四方朋好不余弃,近复强余以为文,屡谢不获,又且忘其妄而为之矣。既已为之不忍弃,思存之而窃自愧。”据懋麟生年,可推作序时其年四十上下,也就是说,自序完全可能与杜序同作于康熙十七年,其时懋麟诗作丰富而古文不多,杜序谓“吾友汪蛟门先生辑其初集新成,亟以一编贻余”,此初集一编即包括诗歌十六卷和古文三卷。现存懋麟全部古文中康熙十七年以前所作者不多,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此自刻三卷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

①懋麟生年或作1640,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百尺梧桐阁集·出版说明》,然王士禛《比部汪蛟门传》云:“(蛟门)大笑,呼奇绝而逝,实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准此,懋麟生年应为1639年,即崇祯十二年。

②王士禛:《比部汪蛟门传》,《百尺梧桐阁集》附录,《四库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241册,第802页。

③《百尺梧桐阁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版,第4页。下文凡引此书,仅说明卷数,不另注。

图书馆等处。

十卷本系懋麟自刻增修本,刊刻于其罢归以后。其侄汪荃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为《百尺梧桐阁遗稿》诗十卷所作序云:“公之古文,自归田后增刻数十篇在前集内,其遗稿数十篇与《明史拟稿》二卷、《琉球国纪事》一卷及《四声古叶录》、《通志闲编》诸书,将别辑成帙以传也。”^①“增刻数十篇在前集内”,指在三卷本的基础上增刻,增刻的数十篇主要是懋麟康熙十七年以后所写的古文,尤其是为数众多的表幽之作。此自刻十卷本今存湖南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处。

八卷本系汪荃康熙五十四年刻,时懋麟歿已二十余年,荃董理残编,分书、序、记、书后、跋、传、墓志铭、墓表、碑阴、杂文、祭文、行状共一百三十九篇,厘为八卷。此八卷中的实际篇数无疑远多于十卷本,其中自然包括汪荃在《遗稿》序中所提及的“遗稿数十篇”的一部分。但八卷本所收,仍然不是懋麟古文的全部,汪荃在序中说得很清楚:“若干所未刻者,俟有心者与,商略成之,予力所未逮也”,例如“古文有史论若干篇,公临终尚拳拳于口,迄无人可托以此事”。而今八卷本中,史论竟一篇未见。

焦循所评阅者,即汪荃所刻八卷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文集》卷一首叶下第三行有行书墨迹,题“后学江都焦循阅”,若干篇文后有同样的行书墨迹批语,经笔者核对,确系焦循手迹。焦循何时评阅此书?《诗集》卷四末有手记云:“嘉庆六年正月初五日晨起阅至此,时客武林节院。”《雕菰集》卷二十《诚本堂记》云:“嘉庆五年,岁庚申,夏四月,浙江抚军阮公以书招余。冬十月,为武林之游,寓居节署诚本堂之东偏。”^②焦循子廷琥《先府君事略》云:“辛酉之春,回扬州,送不孝至泰州院试。”^③则此书的评阅系焦循于嘉庆五年庚申(1800)十月至六年辛酉春在浙期间进行。评阅从《文集》开始,至嘉庆六年正月初五,评阅完《文集》八卷、《诗集》十六卷之前四卷。或因有它事打断了《诗集》的评阅进程,故卷四末留下备忘手记。但余下的《诗集》十二卷圈点较少,末卷最后亦有批语,从嘉庆六年正月初五后到同年春季焦循返回扬州前评阅完成,应该不成问题。重要的是,此一事实可以补入焦循年谱及其著述系年。

二、焦循对《百尺梧桐阁文集》的评阅

焦循评阅懋麟《文集》八卷,标点二篇;圈阅三十四篇,其中加批语者九篇。九篇的批语虽然简要,但或褒或贬,快人快语,且颇中肯綮,宜分三类述之。叙述过程中适当节引懋麟原文,一方面便于说明焦循评阅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可以窥知汪懋麟这位清初扬州籍文人古文写作的成就及其得失,一举而两得焉。

①《百尺梧桐阁遗稿》汪荃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1册,第799页。

②《诚本堂记》,《雕菰集》卷二十,清道光岭南节署刻本,下同,不另注。

③焦廷琥:《先府君事略》,《焦氏遗书》本,衡阳魏氏藏板,光绪丙子秋重刻。

第一,激赏懋麟为文的出色之处。

在卷一《与陈椒峰书》中,懋麟针对陈氏责其治父丧违俗“先君行述后,未列某某填讳”一说,逐层加以辨析。先引《礼记·曲礼》及《檀弓》所述丧制,以明“不孝于初丧,固非当讳之时”;次则假设“请于当代名卿先生,求赐之传铭,于义又不当讳矣”,随即反问道:“《礼》云‘诗书不讳,临文不讳’,述其亲之生平,而先自匿其名,天下后世何以称也?”复援引古人“子可以名父”的事实,证明子为父作行述,可以不讳其名,无须请达官贵人“填讳”,最终揭露所谓“填讳”,其实质不过“例假贵人,或隔百里千里,必书其官爵以为荣”,而扬州风俗,“书贵人姓名,甚或书数贵人为光显,不尤可怪乎?”如此力倡移风易俗之文,令焦循大为赞赏,批云:“循所欲言,先生为我言之于先,读之不觉一快。”全文逐层牵引,步步深入,纤徐曲折,说理周详;言古代丧制,五引《礼记》,必本于经,与曾巩质直严正、独存简古的文风颇为相似,故焦循又叹赏道:“曾南丰不过如是尔尔。”有意思的是,焦循评阅此文十五年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对懋麟此文中的观点记忆犹新。在《答黄竹云》书中,焦循云:“行状中宜书名,临文不讳,在述先德,尤不可讳。江都汪蛟门先生有文论此事,刻《百尺梧桐阁集》中,是可法也。”(《里堂札记·丙子手札》)

卷二《宋牧仲诗集序》实际上是一篇叙述传神的人物传记,清代扬州文人别集中能有如此文笔者并不多见。文章记述宰相宋权之子宋牧仲(莘)二十年前后的变化。少年时代的宋牧仲入侍禁中为侍卫,其时“年甫十四,仪观俊伟,冠侍从冠,蟒衣袴褶带刀,侍上左右”。作者以其将皇上所赐食品怀归孝敬祖母的细节,突出其孝心可嘉:“上爱重之,每赐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对食逊避,私出带间斜幅,裹饼饵枣栗,将怀之。上怪问,牧仲前跪谢曰:‘臣有祖母老,甚爱臣,臣怀以献,荣上之赐也。’上喜,自是每赐食,必尽敕以归。”一个在君上面前不避嫌疑、英俊潇洒、坦诚可爱的青少年形象跃然目前。作者继又以绘声绘色的描写,刻画其果敢英豪之气:“上尝猎,过溇沱河,牧仲从。时天大寒,河水阔二丈余,牧仲扬鞭大呼,一跃而过。”二十年后时过境迁,此时的宋牧仲“时时卧疾,居必重户,出必重帟,稍触风即大病”。当年那个“以宰相子为侍从,被服如天人,饮啖上前,弯弓从猎,怒马渡河,意气殊自豪”的宋牧仲早已不复存在,“放浪山水,溺意文字,萧然下同贫士,四体清羸,不复自振”。写尽了人间升沉变易、遽若两世的沧桑之感。焦循惊异其文笔之栩栩如生,批云:“此叙处风神耀耀,不愧作家。”恰到好处地概括出懋麟白描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不愧作家”之说,出之于焦循,是极为难得的评价。

焦循评懋麟《选韩诗序》(卷二)一文曰:“极廉刻之致。”言简意赅,拈出汪文此作于平易之中有刚劲廉简之美,峭刻顿挫之味,显示出焦氏独到的眼力。此序不过三百零七字,下语往往直逼要害处,概括力很强。起首数句论有唐二百八十九年中以诗名者,独推杜甫;中幅数句论继杜甫者又独推韩愈一人,以其为诗“窃有意于甫,而又不欲遂以甫之诗为之”,“遂自为愈之诗,而非甫之诗,人亦自

然知非甫之所为而为之者,惟其愈而已”;末幅若干句先深憾于“古今学诗者,知甫不知愈,谓愈之非甫也,岂第非甫,且以为甫病。是不知愈,又岂知甫者哉?甫之学鲜能传者,传之惟愈”,然后逼出选韩诗的宗旨。焦循对这些纵观诗史而得出的结论性断语密密加圈,以其廉简也,峭刻也,故曰“极廉刻之致”也。

除了对以上之文加批作评以示赞赏外,焦循对《文集》的圈阅文字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也颇可关注。

焦循在《文集》中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是懋麟的文学批评。懋麟厌唐人之应制诗赋,因为这种应试文体,“主司以声韵为程,而士子绳趋步追,不敢逾尺寸,其音促,其旨浅,卑卑乎无足观矣”(卷二《赋序》)。焦循圈阅同意这种说法,但他对受到唐代律赋影响的明清八股文却充分肯定,这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懋麟在《韩醉白诗序》(卷二)中谓论诗者怪其“去唐而趋宋”,其辩云:“夫其学必已至乎唐,而后可以语乎宋。如未至焉,而遽测以耳,岂惟不能知夫宋之诗,究亦未尝知夫唐之诗而已。”焦循圈出,以为有识。在《宋金元诗选序》(卷二)中,懋麟进一步申述上见,云:“时会所至,何能强而同之也……余尝论唐人诗如粟肉布丝、金犀象珠,足以利民用而济其穷,诚不可一日无。若宋元诸作,则异修奇锦、山海罕怪之物,味改而目新,学之者必贵家富室,无所不蓄,然后间出其奇,譬舍纨縠而衣布素,却金玉而陈陶匏,其奢侈隐然见也。倘贫窶者骤从而仿效之,适形其酸寒可笑而已。”焦循惟恐览者错过,加圈标出。现当代学人关于唐宋诗高下之分,以及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众说纷纭,懋麟作为清初扬州学者,此论此喻,实导夫先路,不可不予拈出。

焦循在《文集》中感兴趣的话题之二,是懋麟从道德层面对历史人物作出的评判。《释智永墨迹千文跋》(卷四)叙山阴张氏藏智永墨迹千文一本,称此本乃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入王宫得之。懋麟辨析云:“余谓文成公,理学大儒,征宸濠时,如收其所藏,则是利王所有矣。君子一芥不苟,即一物以充类之,何以异于后世以兵为盗者?此可以理断其必无者也。”与为王阳明辩白相反,在《跋韩秀才临锺太傅书后》(卷四)一文中,懋麟却指责锺繇书品与人品两歧:“当操战官渡时,繇送马二千匹,其心乎操久矣,岂复斯须为汉计哉!千古书与人重者,唯颜鲁公,若繇者,亦仅以其书耳。”他人读到这样的两段文字,或许不会特别留意,焦循却圈示于人,此无他,特重人品名节,与懋麟心有灵犀耳。

焦循在《文集》中感兴趣的话题之三,是懋麟对明清官吏选任方面的弊端的描述,如“崇祯初……选翰林院庶吉士,选例先门阀,次才望……故事,庶吉士读书,更治一经,日诵《古文正宗》及唐人应制诗各一篇”(卷五《王御史传》)。选翰林院庶吉士,门阀竟然是优先条件,而入选者习课,尚要日诵唐人应制诗一篇,以有用之时,付与无聊之内容,岂非咄咄怪事!清代官场也有怪异之事:“不见今之宰大邑者乎?朝至官,而暮去任;后者来,前者犹未得去,虽有奇才异能,无所表见,其湮没困折,可胜道哉?”(卷三《送刘次山序》)所述内容有夸张,但任官走马灯式的现象当是事实,其因盖出于吏员之冗,且争相宰大邑。焦循圈剔出明清

官场怪象,说明清乾嘉时期此类现象可能依然盛行。

焦循在《文集》中感兴趣的话题之四,是懋麟对种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揭露。如《与曹峨眉论白乌书》(卷一)斥媚俗之人以白乌向朝廷献祥瑞,提醒曹氏“如有以见其大,则不当作为诗以歌咏之,使传于后世,而遗讥于君子也”。焦循加圈于此数句,深有同感。懋麟认为修方志虽重要却甚为不易,入选人物事迹当慎之又慎。在《重修扬州府志序》(卷二)中,他说:“忠孝、节烈、名宦、寓贤、隐沦、才艺之士,考之往古不世出,而今家龙比而户曾闵;老而寡者以节书,贵而不必德者以贤祀;鄙言恶札,繁縟连篇,人物艺文,至于今何独盛也?”焦循读序至此,驻笔加圈,以为深得己心。^①康熙十一年壬子,楚地一山人自命能测祸福,变死生,京师人奉若神明,从之如狂,懋麟在《辩道》(卷六)一文中怒而斥之:“万一朝廷赫然震怒,问以术士妄言祸福之罪,山人其安逃耶?绳以惑世诬民之法,山人其何说耶?”对此数句,焦循不仅圈出,而且加眉批云:“引律以断!”谓确应依据相关法律,处置此等妖言惑众之徒。愤嫉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直言懋麟为文的不足之处。

焦循为文之根底在于经学,所谓“文莫重于注经”(《雕菰集》卷十四《与王钦莱论文书》),故质实醇厚,雅重平正,自然高古,容不得无根之言,无用闲语。在评阅懋麟之文时,凡遇此等无根之言、无用闲语,其如芒在目,必欲去之而后快,甚至亲笔痛加删削,决不肯为前贤尊者讳。此等处尤可见真性情,若不将文字节录出,无法知焦循修改删削之由与批语之实。

卷三《唐寅高士图记》云:

吴趋唐寅画高士图一卷:一人背笠,倚牛角牵而立,一人指地顾牵者,曰巢父、许由。(中略)图止此,高士凡二十有九,与高士俱者凡十有五。高士各有赞,寅书。牛一,羊三,瓮一,瓶一,井一,床一,几一,簟二,琴一,锄锄、杖笠、书卷、筐筥杂物,各随其人,纤悉入妙。[可谓极绘画之能事,为寅真迹无疑也。]

[昔寅生当文物之盛,抱异才,取巍科,使其得时有为,当必有以自见,卒遭挫辱屏弃,使不得奋力于功名,致放浪不羁,寄情藻绘,若寅者,亦可哀也已。今观其所画高士图,多不以类,或儒或老,或隐或怪,寅皆以高士貌之者,亦从其所尚而已,若绳之以道,则不可。寅殆所谓狂士也與?]是卷宝于浙西沈孝廉尔燬之家有年矣,孝廉贫不能有,将鬻之,而以示余,[余心爱之,为之]展玩竟夕,倾酒一斗,因为之记。[不知其终为谁氏所有也。]

时康熙壬子腊月十[有]九日。

^①焦循对修史志提出“征实”的原则,以使“虚声之士,不致滥竽”(《雕菰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又认为“志书以诗文为艺文,最是陋习。一开此门,而山魅木客,皆可以七言恶诗黄缘收入。”(《雕菰集》卷十三《覆姚秋农先生书》)

文中方括号内为焦循删去文字,后幅大段删节者,焦循有眉批云:“文气卑弱,当删去。”文末又有总批云:“蓝本韩退之;后幅之病,亦由效其后幅之唱叹也。”所谓“蓝本韩退之”,当指此记与韩愈某篇同题材的古文在构思布局方面基本相同。查《昌黎先生集》,卷十三有《画记》一文,正是懋麟此记的蓝本。二者均在前幅中先详尽描述画中的人物、动物和物品,然后分类合计总数,复以一语概括之,韩记曰“皆曲尽其妙”,汪记曰“纤悉入妙”。后幅则交待画的来历,继而感慨喟叹。平心而论,介绍名画,效法韩愈此记,以精细刻画为能事,以示尺幅虽小,有容乃大,这样的文字,宋以来不在少数,仅此一端,尚不足以为懋麟此记之病。况且,懋麟在效法韩记的同时,也根据画作的实际自出新意。如韩愈所记为“杂古今人物小画”,且人物众多,“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故大多只宜以类相从,如云:“骑而立者五人”,“骑而驱者三人”等等,而懋麟所记之画为“高士图”,且人物相对要少得多,故大多只宜逐一而述,以示景仰,与韩记句式词序不同。然则懋麟此文之病在于何?在于后幅之感慨难免东施效颦之讥。韩记后幅先记其获画之过程,对此画“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虽百金不愿易也”。孰知他日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中一人竟是画之作者,奇峰突起,故发数语感慨,乃水到渠成。懋麟之记刻意仿此,已等而下之,而所发之议论,乃慨叹唐寅“抱异才”而不得“取巍科”,“不得奋力于功名”,与《高士图》之立意正相左,更是败笔,宜乎焦循病其后幅,责以“文气卑弱”,所批极是。

《孙处士墓志铭》(卷五)尤可见焦循改笔之优。文章开头云:

白岳孙处士客死扬州,予往哭,其孤匍匐泣而(乞余铭其)[言曰:不肖孤早丧母,吾父怜之。失学,稍长苦贫,从估人糊口江淮,博升斗养,不得在左右。父晚年思归隐黄山,不肖孤冀生事粗理,先筑室山中,后奉杖笠归,耕田汲井以老,今已矣。父性质朴,无他好,惟获交天下贤人君子,罗致其诗古文词,若嗜欲,以故弃百事为之,风雨寒暑,死生存亡不少易,今亦已矣。而所谓贤人君子者,散在四方,安知吾父之死之可悲也。赖先生在,先生不忍死吾父,敢以]墓石[之文请。]予悲而诺之。[其孤遂言曰:吾](处士其)先世,山东青州人……

圆括号内为焦循添加字,方括号内为其删节部分。对被删节部分,焦循有眉批云:“闲话可恨!”确实,被删节的大段文字不妥有二:其一,孙处士(默)晚年思归隐黄山事,及平生好罗致天下贤人君子诗古文词加以编辑事,后文复有叙述,构成重复;其二,以“不肖孤”的口气誉扬其父,不合常情,不合体例。改笔汰去重复部分,又在“予悲而诺之”一句后着“处士其”三字,改去以子述父事口吻,切入作者叙述口吻,直达文末,使得全文意脉畅通,文气流贯。改笔之优,可见一斑。

三、焦循对《百尺梧桐阁文集》评阅之平议

汪懋麟的古文,就总体而言,虽不能与侯方域、魏禧、汪琬、廖燕等人相比,因其水平参差不齐,取材较平,又多表幽之文,故思深致远、特别警醒感人之作不多,但无事摹古,议论允当,文气修洁,平实可诵者所在皆有,佳作可跻身一流。汪荃为其《文集》所作序云:“至于古文,公常自谦退……其剪裁高雅,得古人法度处,窃谓可与钝翁后先,如眉山兄弟,似非余之阿论也。”谓其为文到高妙处可逼似汪琬,此确为持平之论,故研究清代古文,自不应忽视懋麟。清代文学研究领域,清文的研究最为薄弱,但总体的研究,有赖于个体研究提供的坚实基础。

清代江都籍文人中,汪楫诗名早著而文不多见,吴绮工骈体文。其他扬州地区或寓扬的文人中,除王猷定以外,古文能出懋麟之上者少见。懋麟早得科名,交游日广,荐博学鸿词而未试,后被荐入史馆,更使其受到名士推重,求其为文者日盛。其书、序、传、铭、杂文、祭文等,多有涉及清初扬州人事者,因此数端,研究扬州文化,更不应忽视汪懋麟。然而,迄今为止,除了焦循的评阅,汪懋麟其人往往只有在研究清代文人交游时才被提及,而其古文,往往只有在《百尺梧桐阁集》被著录时才被简要叙述,因此,焦循对《文集》的细致评阅,可说是第一次对懋麟古文的关注与研究。他尽管直言懋麟为文的不足之处,但充分肯定其古文写作的成就,以及由此决定的懋麟在清初古文家中的地位。在后来写的《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十二)一文中,焦循将汪懋麟与魏禧等若干人并称为“文苑之雄”,可见对懋麟评价之高。

焦循对《文集》的评阅如前所述,既关注内容,又兼顾文章的艺术表现。内容方面涉猎面甚广;艺术表现方面,举凡文气、风格、语言等等,都显示出严谨的要求。批语虽不多,也足以表现出其观书之博、之细。熟悉韩愈、曾巩之文,发现懋麟《唐寅高士图记》以韩愈《画记》为蓝本,自不为奇;但能对清初的《魏叔子文集》也相当熟悉,甚至指出魏禧与懋麟均针对欧阳修《论狄青札子》有相同的论说,则甚为不易。焦循评阅此书是客于浙中,阮元节院中未见得就能查阅到《魏叔子文集》,其乃凭记忆斟酌,信手拈来。尤可贵者,焦循的评阅总是从大处着眼,从不标示所谓的文法,因为在他看来:“倘无所以言之者,而徒质言之,谆谆于字句开合、呼应、顿挫之间,是扬行潦以为澜,列枯骨朽莖吹嘘之以为气。”(《雕菰集》卷十《文说一》)这种取向,在受八股文影响而特重文法的清代古文评阅中,是十分少见的。

文心如面,千差万别,任何文本的评阅取舍,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评阅者主观价值取向的影响,焦循评阅《文集》也不例外。《上士钱氏传》是懋麟的一篇杂文,它继承了鲁褒《钱神论》、特别是韩愈《毛颖传》“以文为戏”的传统,旁征博引,梳理钱氏名号的古今演变过程,描绘主人公的形象和权势,寓愤世嫉俗于诙

谐滑稽之中。如写钱神之国云：“垒贯为城，楼堞睥睨，无非黄金。以巨钱为门，人垒钱以登，乃得入。其国以钱纪官，贵贱皆以钱为冠。其俗骄悍，多智略，好斗，能杀人而取贵宠，凭势力者必赖焉，故人以为神。”这样的文字，游戏其貌，正经其心，古文中可备一体，韩愈写过，他人仍可以写。早在唐代，柳宗元就专门写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为韩愈辩护，认为《毛颖传》此类文字“有益于世”，焦循熟知，但仍保持传统的看法，批云：“此戏作可删。”其实，焦循对于具有文学因素的戏作并不排斥，而且饶有兴趣，观其论八股文与戏曲的相通之处可知^①。他认为可删，一是认为此类戏作宜别行而不宜收入集中，他说：“人禀阴阳之气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气寓之，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发泄之，则使清劲之气长流存于诗、古文。”^②个人文集中所应有的的是充溢清劲之气的古文，与寓有柔委之气的戏作不同类。正因为这样，焦循在其诗文集《雕菰集》中不收自己的词作。二是因为写此类游戏之文，乃“纵易而拘难，张苦而弛便……且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为奇。有昌黎之文，踵而效之，则陋矣。”（《雕菰集》卷十八《书韩退之〈毛颖传〉后》）如此看来，对于文集中收入戏作与否，汪取而焦舍，古文观有别，故取舍相异，其间本无是非高下之分。

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因为一次评阅或阐释而尽其底蕴。平心而论，今日看来，懋麟《文集》中除焦循圈点赞赏过的篇章以外，仍有因具备各种价值而可观者。《董姬传》（卷五）云：

董氏，江都以死节著闻韩文适先生家姬也……当乙酉城破时，先生与夫人萧氏及其长子将就死，夫人痛韩氏之绝也，抱三岁儿泣拜姬，姬泣受，裹诸怀，即夜遁。当是时，万马屠城，城中火起，照锋刃如雪，天大雨淙淙，与戈甲声乱，杀人塞坊市。姬匍匐蛇行，刀头马脚之下，伏死人中，祝儿曰：“天不绝韩氏，勿啼。”儿果屏息怀中。从城窰出，匿江滩，拾麦穗啖儿，得不死。

此儿即后来的江都籍诗人、懋麟之挚友知交韩魏（醉白）。董姬于万马屠城、锋刃如雪的危难中负幼儿偷越扬州城、死里逃生的事实，懋麟谓“自余交醉白二十年，酒间慷慨涕泪，盖熟闻其说者”。时董姬健在，韩魏事之如生母，亲述已事，故确凿无疑。由此知《扬州十日记》中的记载是充分可信的。

《江都知县周公传》（卷五）记周志畏协同史可法守卫扬州城，抗击清兵，双双就义事，颇有参考价值；杂文《郭猫儿传》（卷六）为清初扬州善口技者郭惟秀作传，叙次简洁传神；《嵇阮优劣难》（卷六）“高籍而下康”，不可谓非一家之言。今人言明末清初徽人来扬事迹，动辄誉扬徽商或徽商中之崇文者，而懋麟《孙处士墓志铭》（卷五）中所记者或乃足以名高后世：

①参见笔者旧作《八股文与明清戏曲》，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②焦循：《词说一》，《雕菰集》卷十。

夫处士去休宁而来游于扬也,居一椽,从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饮。乡人多大估,居积于扬,竞尚居室、衣服、饮食、伎乐,处士望见,则摇手闭目去;见通人大儒,即折节愿交;而于寒人畸士,工文能诗,或书画方伎有一长,必委曲称说,令其名著而伎售于时也然后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归之。朝一客至,即叩诸闻人之门,曰:“某某来”,暮一客至,又叩之不倦。处士长身高足,深目朗眉,服被甚古。见其遇风日以扇障面,疾行衢巷,或蹶蹶霜雪泥淖,知必四方客至,而处士为之来叩也。见即出卷帙阔袖中,累累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至壮至老如一日……孙处士讳默,字无言,人无识不识,皆称无言,故以字行。

或外貌,或衣着,或动作,或语言,或居住环境,懋麟以精细的描述,刻画了清初来扬徽人中一位高士的形象,令人拭目可见,触手可及。任何时代,具有精神价值的核心文化的传承,端赖这样的人。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选本的力量

——《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之比较

顾 农

齐梁时代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衰世,例如唐朝人批评齐梁文学的言论就多到不可胜数,杜甫的诗句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其五),韩愈甚至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其实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齐梁文学界决非漆黑一团,这时也曾出现过若干比较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而更重要的则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里连续产生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和萧统《文选》,三部名著闪亮登上历史舞台,空前绝后,形成了一道光芒万丈的壮丽景观。

这三部书,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著作,前二者是理论批评专著,而萧统《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作家,古代习惯于称为“总集”^①。但是古人并不一定这么看,《隋书·经籍志》就把这三书都列入“总集”类,而列为该类之首的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②。这种情形虽然似乎有点古怪,但我们只能设法加以理解,同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虽然早已有所开始,但真正自觉总要到魏晋之后,起先这种批评往往见之于书信中或口头上^③,带有明显的私人

①总集,起先专指选录了若干作家作品的集子,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选集,产生的原因是“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隋书·经籍志》),示读者以精华;到比较晚的时候,又产生了《全唐诗》、《全唐文》这样一种大型的文献资料汇编,其性质也属于总集。清代以后以至于当代,以“全”字开头的总集越出越多,其读者大抵是专家;一般读者大抵根本不理睬这种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汇编,只读各种分量比较小的选集。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文评类》叙曰:“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隋(书·经籍)志》附总集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可见直到唐初(《隋书》修于此时)“诗文评”尚未有独立的地位,只得附列于总集之内。

③《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参见顾农《庾亮的文学批评》,《书品》2005年第3辑。

性质,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更有效的形式,这就是编撰文学作品的总集:选家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就选进来,而评论意见也就寓于其中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史家出而论文,总是将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的兴衰教训等等联系起来考虑;而文学家论文,则往往把理论批评与从事创作或学习写作放在一起考虑,所以后者的理论批评往往与文章学有割不断的联系,《文心雕龙》一书曾经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写作学的著作,所见虽无不偏至,但仍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并不妨碍同时承认它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巨大贡献。想清楚这个道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便会有真切的体认了。古代文论总是从具体文学作品和体类的批评入手;脱离文学文本、脱离创作实际的纯理论,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总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根据也在于此。在齐梁时代以至于更晚一些的时候,选家就是评论家。将齐梁三书放在一起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

萧统的弟弟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写道:“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致,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头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疵,览无遗功,可谓学矣。”可知当时编撰选集(总集)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提供了解文学史的读本,这样的选本当然应该出自专长于“品藻异同”的批评家之手,而不是学者或学究之手。

《文心雕龙》虽然并非选本,但非常注意研究文本,书中包含了选本的某些要素。该书第六至第二十五篇,专门用来“论文叙笔”——按文体研究文本,他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中“选文以定篇”正是选家的当行业务。把刘勰选定的各篇编排起来,就是一部刘氏的文学作品选。拿萧统《文选》同刘勰的“选文以定篇”相较,选目有异有同,从中可以获得许多理论批评方面的信息^①。

按文体进行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先前的选家如挚虞早已在《文章流别论》中做过,另一位选家李充在他的《翰林论》中也曾经做过。《文章流别》和《翰林》都是作品选,其中附有批评性、理论性的说明;这两部选本后来失传了,仅存其理论批评部分的片断。挚虞和李充在文学批评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正是刘勰、钟嵘的先行者。

钟嵘在《诗品》一书中将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给予简要的评论,全书的序言则深入地探讨了若干理论问题。《诗品》原书中很可能是带有选篇的,这一部分后来失传,于是就只能看到他的评论了。这种情形很有点

^①顾农:《试论〈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一文第三、四两部分,《文选论丛》,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69~77页。